

“Are you a foreigner?”: Taiwanese Deaf People's Accent and Experience of Identity Misrecognition

Tsung-Lun Alan WAN

「你是外國人嗎？」： 台灣聽障者的口音與身份誤認經驗^{*}

萬宗綸^{**}

* 我要感謝兩位審查人、編委會、主編黃宗儀以及編輯助理鄭力豪對本文提供的寶貴建議，尤其感謝田野期間，接受訪談的各位受訪者對本研究的支持。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22 年台灣人類學年會，感謝鍾鎮城的評論以及與會人士之回饋。

** 萬宗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系助理教授。聯絡方式：tla.wan@nycu.edu.tw。

摘要

口語族聽障者使用的華語口語會帶有所謂的「聽損口音」；然而，由於聽人對於聽損口音缺乏認識，在日常生活中聽見聽損口音時，常會誤以為對方是外國人。在這種情況下，聽障者遊走於兩組身份之間：作為聽人的外國人，以及作為聽障者的台灣人。本文混合量化分析與敘事分析討論台灣成人聽障者如何敘說自身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量化資料發現當研究者主動誘發受訪者討論身份誤認議題時，約有74%的聽障者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然而，在研究者未主動提及此議題時，只有約44%的聽障者在討論障礙經驗時主動提及被誤認經驗，而且全為女性。透過敘事分析，本文發現聽障女性面對被誤認經驗時，以不同敘說方式將誤認經驗回饋到自身對障礙者身份的理解，而相較之下聽障男性傾向孤立身份誤認經驗於障礙身份敘事之外。本研究指出，身份誤認過程對於一些聽損受訪者而言具有直接的社會心理傷害，身份誤認暗示了自身聽力障礙之「嚴重」體現在自身口語表達上，尤其是當被誤認的國族身份係在台灣社會有時被負面看待者（如：東南亞、中國）；相較之下，有的受訪者則是視情況佯裝為外國人，如果被誤認的國族身份具有某種種族化的文化優越性（如：日本、韓國）。

關鍵詞：敘事研究、社會語言學、女性主義障礙研究、交織性、污名管理

Abstract

Orally educated deaf people speak Mandarin with the so-called “deaf accents”. Yet, hearing people are usually ignorant of deaf accents and often misrecognize deaf accents as foreign accents. Mistaken for foreigners, deaf people are faced with two competing identities – hearing foreigners and deaf Taiwanese. Adopting mixed method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aiwanese deaf adults discuss their experiences being misidentified as foreigne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around 74% of deaf people have experiences of identity misrecognition when the researcher elicits identity misidentification narratives from them; however, when the researcher does not mention this issue, only around 44% of the participants mention such experiences in their narratives of disability, all of whom are women. Nar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deaf women relate identity misrecognition back to their self-conception of being disabled, and in contrast, deaf men tend to disconnect such experiences from disability. The current study reveals that identity misrecognition can be socio-psychologically harmful to some deaf women because the act of misidentification per se highlights how the ‘severity’ of hearing loss is to them,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mistaken for persons from nations whom the mainstream Taiwanese society express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e.g., Southeast Asians, PRC Chinese); in contrast, some deaf women,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may pretend to be foreigners if the misperceived nation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a certain racialized cultural prestige (e.g., Japanese or Koreans).

Keywords: narrative analysis, sociolinguistics,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intersectionality, stigma management

一、前言

障礙研究 (disability studies) 2007 年開始在台灣深耕後，分散於各個領域的台灣障礙研究學者逐漸強調障礙的社會性、文化性與歷史性，而非單純強調生理損傷的應用性研究 (林駿杰、張恒豪 2020)。障礙研究的文化模式 (cultural model) 透過探索符號與意義，強調符號系統、社會分類、機構化過程、人造物、文化實踐等面向，如何影響障礙者的社會位置、社會關係，乃至於主體化 (subjectivation) 的方式 (Waldschmidt 2017)。在眾多障礙類別中，聽覺障礙的社會文化層面已累積不少本土研究，比如教育場域中的聽障青少年認同 (吳佳臻 2014) 與聽障女同志學習處境 (郭曉蓁、游美惠 2013)、成人聽障者的旅行實踐 (周淑惠等 2009)……等等。這些課題係聽人 (hearing people；無聽力損失者) 也會面對的生命歷程或活動，從中探索聽人主導的社會結構，如何壓迫聽障者，並製造出障礙的生命經驗。

除此之外，有一些障礙經驗，是障礙者一定程度上共享，非障礙者卻不容易經驗到。譬如，障礙者的故事常被非障礙者視為「勵志故事」，這種權力不對等的生命經驗凝視稱作「勵志色情」 (inspirational porn)，是典型的非障礙者缺乏之生命經驗 (Chrisman 2011；Grue 2016；紀大偉 2012)。另一個例子是「障礙微歧視」，儘管受壓迫群體皆可能經歷微歧視，展現方式各有不同，障礙者會面臨包括「憐憫」、「同情」、「施捨型讚美」或者預設障礙者需要人幫助等「微歧視經驗」 (董怡寧等 2022)。再如，障礙者面臨的醫療化 (medicalization) 深刻地作用在障礙者的自我認同，醫療論述除了形塑障礙為負面的生理損傷外，也可能成為障礙者界定自我，甚至用以爭取實質平等、輔具補助、培力自身的論述資源 (Grue 2015；詹穆彥 2017；譚芃 2020)。以聽障者為例，聽力科技作為醫療人造物如何形塑聽障者對自我的認知，是許多本土聽人研究者的關注焦點 (林韋成 2019；萬宗綸 2016, 2021；歐子瑩 2020)。聽障者更因為面臨口說語言溝通的壓迫，在口說語言治療 (醫療化體制) 與手語學習 (聾人文化常模) 之間發展出離散的文化認同 (張稚鑫 2004)，也在日常生活的資訊取用權利受限下 (醫療人員配戴口罩使得讀唇困難、同步聽打服務補助不足等) (游政諺、陳孝平 2015；陳好甄 2021)，逐步發展出障礙自我的認識，進而運用各式策略，抑或是重新調整對聽障身份的

自我認知，來面對社會對障礙者的分類與壓迫，以及隨之而來的互動。

本文關注聽人不易經驗到，但聽障者一定程度共享的障礙經驗——因「聽損口音」（deaf accents）¹而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本研究探討這種經驗如何影響聽障者對障礙身份的理解。因緣際會下，我在進行聽障身體地理學的研究時（萬宗綸 2016），意識到許多聽障者共享身份誤認經驗。2014 年，我進入聽障田野的主要報導人之一——小君——主動指出帶著東南亞色彩的聽損口音是她很大的困擾（詳細請見本文的敘事分析）。國外聾人學者亦時常提及自己被問「是哪裡來的」，感到無奈或憤怒。我主要交流的聾人學者多居住於美國，而美國因為國土面積大，聽損口音通常不會馬上聯想至外國人；被當成「南方人」是一個可能性。然而，「南方口音」在美國是受到污名的——在社會語言學實驗中，受試者在不知道錄音檔中的說話者身份時，傾向將帶南方口音特徵的錄音檔連結至「未受教育」、「鄉村」與「鄉巴佬」（redneck）（Campbell-Kibler 2007）。這種南方口音連結的負面特質可能讓聽障者面臨另一種污名情境。2018 年本研究的受訪者麥脆²提醒我，身份誤認這個主題並不新穎。她提及，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中的角色文清（梁朝偉飾）便有類似經驗：文清是聾人知識份子，在片中描述的二二八事件時代背景下，文清在一列火車上被幾個陌生人用台語詢問來自哪裡。文清慌忙地起身，然後吞吞吐吐地也用了台語回答「台灣人」。帶著聾人口音，幾個男子並沒有因此放他一馬，再用日語問了文清要去哪裡。只見文清這下沒輒了，男子們遂而認定文清不是台灣人，對其正要一頓打，直至文清的朋友見狀衝出阻止，說著「他是聾子」，幾人才面面相覷。經過數十年，2012 年化名為綠蜥蜴的聽障藝術家呂欣怡在公民新聞上發表一個影音新聞，名為〈我們不是外國人〉³，裡頭提到「你們是從哪裡來的？」是聽障者最常聽到的問題。然而，儘管「被誤認為外國人」可以說是聽障者的普遍經驗，甚至經典電影也曾設計過相關橋段來暗喻台灣人的身份政治議題，國內外都尚未針對聽障者的此一經驗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1 本文使用「聽損口音」一詞而非「聽障口音」係為了強調口音本身來自於聽力損失所致的生理現象；使用「聽障者」一詞時，則是為了強調社會對聽障者造成的壓迫因而產生的「障礙」。

2 本文提及受訪者皆使用化名，除了 2014-2015 年受訪者使用我創造的化名外，2018 年之後參與研究的受訪者皆自行提供化名。這個做法能夠讓受訪者辨認研究者有無扭曲或不精準地呈現其敘事。

3 請見 <https://www.peopo.org/news/99568>（擷取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

儘管台灣內部也有華語（Mandarin）口音的異質性（族群與地方口音），一般人傾向會將不熟悉的口音連結到外國人。值得注意的是，「聽損口音」被誤認為「外國口音」這樣的經驗，並不需要「口音真的不同」這樣的事實基礎。在這篇文章裡，我關注的是認為自己因為聽損口音而被誤認為外國人的主體經驗。比如一位受訪者淑倫成長自眷村，帶著典型的眷村口音，而常被問是不是「陸配」，但在淑倫的自我認知中，是聽力損失而非眷村經驗導致她有「陸配口音」。亦即，聽損口音與外國口音的連結即便不需要實在論意義上的連結，也在聽障者的主體經驗上構成普遍現象。相反地，一位受訪者小惠儘管有聽損口音，但她堅持，被誤認為韓國人是因為膚色跟穿著，跟口音沒有關係；像這樣的案例，就會被排除於本文討論的範疇。

撇除掉穿著風格、外型加上所處場合而偶然發生的「身份誤認」，「結構性的身份誤認」多是來自於社會主導群體對於特定群體的結構性暴力。馬蒂諾（Wendy Martineau 2012）指出身份誤認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故意為之，通常是掌有社會優勢的群體為了維繫某種社會秩序而有意否認其他群體的身份；一種則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非故意的、因為錯誤（或無知）而導致的身份誤認。兩者都會對於被誤認群體產生實質的社會心理傷害。後者儘管看似非故意為之，但在政治上並不是無辜的；相反地，馬蒂諾認為，非故意的身份誤認仍然延續著一種不正義，即制度化的文化價值使得某些行動者成為日常生活社會互動中不完全的參與者，他們被排除於社會，成為看不見（invisible）的他者。

從過去的經驗研究來看，故意為之的身份誤認常以「否認」的形式出現。主導群體明明認知到受壓迫群體的存在，卻刻意強調該群體在歷史上不屬於所處社群，自然化該群體的他者身份、合理化自己的誤認行為，並否認被誤認群體自我認同。這常見於移民社群的經驗。比如，美國主導群體明明知道美國有非白人移民與其後代，卻仍然讓亞裔族群承受「永遠的外國人刻板印象」（perpetual foreigner stereotype）（Huynh et al. 2011）——亞裔美國人即便表明了自己是美國人，仍不停地因外貌或口音而被問自己「原本來自哪裡」（originally from），進而增加憂鬱、焦慮的心理健康風險（Huynh et al. 2011）；或是歐陸國家的穆斯林移民後代，在各種場合中，被主導群體詢問原本來自哪裡，並認為只要他們是穆斯林，他們就不能是法國／荷蘭人，因而危

害其國族認同 (Da Silva et al. 2022)。

非故意為之的身份誤認，通常以「誤解」的形式發生。因為結構性暴力，使得主導群體儘管知道受壓迫群體存在於自己的社會，卻沒有意識到受壓迫群體會出現在自己周遭，而先想到其他群體。比如台灣原住民族經常有身份誤認的敘事：被台灣移民官或警察誤以為是東南亞外國人。⁴ 也有可能是主導群體完全對被誤認群體的生命經驗處於無知狀態：例如，地理學者霍普金斯 (Peter Hopkins) 等人發現由於蘇格蘭社會對於南亞社群的同質化 (homogenization)，南亞裔錫克教、印度教徒在公共場合常被概括誤認為穆斯林，而面對如此誤認，有些人因此避免與陌生人互動，有些人則選擇以幽默回應，或趁機向他人解釋南亞社群的內部異質性，增進蘇格蘭社會對南亞裔社群的認識 (Hopkins et al. 2017)。

上述經驗現象中，受誤認群體在人口學上的真實身份，通常並不會讓其陷入污名情境，反而可能讓他們脫離污名情境 (Goffman 1963)。使用口語的台灣聽障者在社會心理意義上，並不自我認同為慣用台灣手語的聾人社群，亦不享有主流聽人社會的歸屬感 (張稚鑫 2004)。相反地，很大程度上，口語族聽障者仍透過障礙的醫療模式來理解自身的身體，亦即，聽力損失是一種生理上的缺損，這使得聽障身份本身是會促發污名情境的可貶 (discreditable) 特質 (Goffman 1963)。

當聽損者因開口而被誤認為外國人時，面臨著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所稱的「污名管理」 (stigma management)：如果否認自己是外國人，並解釋自己的口音來自於聽力損失，那麼便是暴露於聽障的污名情境中。在此，污名指的是「個人不被社會完全接受」的一種情境，而聽力損失在健全主義的社會中，便是使個人不被完全接受的特質。譬如，在當代台灣社會，障礙身份的現身，即便沒有遭遇明白的負面攻擊，也時常會讓障礙者面臨微歧視話語 (董怡寧等 2022)。從污名管理的角度來說，聽人對於聽損口音的誤認，本身便可以成為「消除障礙污名的指標」 (disidentifiers)：聽障者可以透過「外國人身份」作為掩護以「佯裝」 (passing) 為聽人 (Goffman 1963)。從理論而言，為了

4 譬如排灣族歌手阿爆就在訪談中提及自己在台灣的機場過護照查驗時，經常被指引到外國人通道。見〈The KK Show - #11 排灣的 Rihanna (自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v51nXWuqU> (查看日期：2023年1月4日)。

避免陷入污名情境，聽障者會選擇接受聽人詮釋其口音為外國口音，藉此得到掩護，進而佯裝為聽人。然而，由於既有文獻的缺乏，實際上聽障者面對誤認經驗會如何理解與回應、誤認者有何反應，乃至於誤認經驗與誤認者的回應會對聽障者的自我認知有何影響，在經驗研究上都還未得到系統性地描繪。本文便是要補足這個經驗研究的缺口。

過去在學術場合談論此議題時，我發現許多聽人研究者並不熟悉為何聽障者會有不同的口音，使得對此議題有理解上的門檻。因此本文第一部分簡要介紹聽損口音。文章第二部分解釋研究方法，並用量化方式勾勒資料樣貌。第三部分深入身份誤認經驗的敘事，討論聽障者敘說相關經驗的方式。

二、聽損口音與障礙身體

「聽人」（無聽力損失者）主導了口說語言的演化與發展。在幾乎所有的語言社群中，口說語言的標準皆由聽人主導。口說語言是基於聽人的聽力來發展區辨語意的語音差異。可想而知，聽人不會使用自己無法聽見的聲音差異來區辨語意，例如超音波。在聽損或聾人社群內部，什麼樣的聲音是可取用（access）的，便因為個人生理狀況不同，呈現高度異質；再者，與聽人所感知到的聲音相比，借助聽力科技（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聽到的某些聲音也可能因為機器轉換而有所不同。由於對聲音的感知存在差異，聽障者與聽人發出的語音可能會出現差異，而產生各式各樣不同的「聽損口音」（deaf accents）。

聽障者不一定會有聽損口音。並且，聽損口音有極大的異質性，不只有一種聽損口音。若與聽人的標準語音比較，聽損口音是個光譜，亦有「濃」或「淡」的區別。這裡的「濃」與「淡」係奠基於與聽人標準語音的差別，取決於非常複雜的個人因素，包括聽力損失程度、語言治療介入年齡與長度、聽覺輔具介入年齡、家庭支持……等等。聽損口音較「淡」者，在具有區辨語意功能的語音上，較沒有展現出差異，有的人可能是帶有鼻音或是發音位置偏向口腔後部，不大影響聽人的理解；聽損口音較「濃」者，可能會在子音、母音或聲調的展現上，出現較大的不同，比如尸或彳變成ㄗ、ㄗ變成ㄨ或ㄨ變成ㄨ、二聲與三聲合併等等，因為這些語音在華語具有區辨語意的功能，可能會導致聽人較容易注意到口音的不同。

不同的口音特徵可能會連結至不同的國族身份：比如聲調的不同可能會連結至香港人、印尼人；過度捲舌則連結至中國（北方）人；子音的不同（譬如ㄨ變成ㄣ、ㄨ變成ㄣ）可能連結至日本人（方淑華等 2015）。詳細語音特徵與各國華語口音之連結可能性非常多，亦非一對一關係，在此不列舉。身份誤認也可能取決於當下的情境、當事人的膚色、妝感與穿著，以及出現的地點……等等。

在聽人的認知中，聽損口音通常不會聯想到聽障者。例如，在感知實驗中，聽人受試者在不知道說話者為聽障者的情況下，可能會認為聽損口音透露著說話者「不識字」或患有精神疾病、智能障礙等（Cowie and Douglas-Cowie 1992）。在台灣的脈絡，聽障者可能被認為有「大舌頭」。「大舌頭」在網路上是負面意義。例如，身為聽障者的遊戲實況主「禾卯《小柳》」就在還未公開自己有聽力損失時，被觀眾認為他說話的「大舌頭」聽起來「很像啓智兒」、「很靠北」、「很不舒服」，或甚至認為他是故意「不好好講話」，然而似乎極少或沒有人將他的說話方式聯想到聽力損失。這導致他甚至必須將這些留言截圖下來（圖 1），另外錄一支影片公開自己的聽障身份。



圖 1：遊戲實況主「禾卯《小柳》」的聽損口音遭受惡意留言攻擊（影片截圖經「禾卯《小柳》」頻道授權使用）⁵

5 擷取自影片〈【小柳】我是一位聽力障礙人士，我其實聽不到聲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zm5MjFZD0>（擷取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

這種誤解源於聽人對聽障者的社會語言現實（sociolinguistic realities）理解不足，正如「聾啞人士」一詞所透露的刻板印象，該詞排除了會說話的聽障者，預設聽障者皆無法使用口說語言。語言表現不只是透露說話者的身份訊息，語言表現的差異也蘊含著不同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能讓使用者享受不同優越性甚至社會經濟資源（Bourdieu 1991）。這種情形尤其可見於發展出標準化的語言形式的社會裡，語言人類學者希爾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 2003: 219）指出，標準化的語言挾著霸權，讓其成為所有不同語言形式中最為「頂尖而核心」（top-and-center of all variability）的形式。這種霸權的形塑，會讓一些社會背景的人在面臨「標準」時產生語言焦慮，因為他們認為自身的不標準語言形式是劣等的。被認定為劣等的不會限於語言本身，歸根究底，關於各種語言形式的評價是針對與語言形式連結的社會身體。語言不只是從特定的身體產製而出，語言本身亦能生產身體，說話本身就是一種身體的實踐（Bucholtz and Hall 2016）。在這個意義上，當聽障者的口語被聽人理解為來自智力障礙者、文盲或精神疾患，在社會互動上，聽障者的身體也被依此分類且對待。不過，日常面對面的互動，畢竟不是實驗室情境或網路上的匿名留言，不大可能初次見面便問對方是否有「智力障礙」或是「不識字」等等；取而代之，相對有禮貌的問法便是「你是哪裡人？」。

本文接下來將基於這個對語言與身體關係的理解前提，討論聽障者如何看待因為口音而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輪廓

本研究從 2014 年 6 月開始陸續訪談大台北地區的成人聽障者，直至 2020 年 8 月。一共訪談了 37 位成人聽障者。不需要具備身心障礙手冊，只要具有雙側聽力損失即可。訪談皆使用口語（華語）為主要語言，搭配筆談作為輔助。根據受訪者自己填寫的資料，有 15 位男性與 22 位女性（這個數字包含最開始的報導人小君）。受訪者皆為漢人。這些受訪者的來源有二：滾雪球抽樣以及臉書公開社團張貼招募啟事。本研究沒有接洽機構尋找受訪者。訪談皆為半結構式訪談，大部分為一對一訪談，其餘有的為情侶（兩人皆為聽障者）、室友（兩人皆為聽障者）、朋友（兩人皆為聽障者）或家長（家長為聽人或重

airiti

聽者) 結伴參與訪談。結伴參與訪談者，因為較熟悉另一位受訪者的口音，在研究者無法理解受訪者口語時，會適時協助翻譯。訪談者為本文作者（男性漢人），公開的聽力狀態為聽人。若沒有特別說明，則訪談皆以華語口語進行，搭配少量華語筆談。

這 37 位受訪者（附件一）被區分為兩組：第一組是「誘發敘事組」（elicited narrative）（N=19），我主動詢問是否曾因為口音關係而受到身份誤認，這個問題放在「日常生活中與聽人溝通遇到的困難」之後，因此若受訪者在指定問題之前就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主動提及受誤認經驗，他們的資料歸於第二組。第二組是「自發敘事組」（spontaneous narrative）（N=18），亦即我不主動提起這個話題的情況下，受訪者是否會主動提及受到誤認的經驗。這個研究設計來自於起初將「是否被誤認為外國人」作為問題放進訪綱時，雖然許多受訪者皆表示有相關經驗，卻沒有多談，使得我好奇是否其實身份誤認的經驗並沒有我想像得那麼重要。因此，在後續的訪談中設計了「自發敘事」的訪談，以瞭解在研究者不誘導的情況下，聽障受訪者是否仍提及身份誤認的經驗；如果有，會如何將被誤認經驗整合進自身的障礙經驗敘事中。

研究者誘發受訪者陳述相關經驗時，受訪者會有較高度的自覺，留意到研究者正在聚焦於其身份誤認經驗。因此，受訪者可能會對於身份誤認經驗呈現出高度反身性的敘事，敘事本身也會相對孤立於其他障礙經驗。相較之下，若受訪者主動將身份誤認經驗敘說進障礙敘事中，受訪者係試圖揀選身份誤認經驗以描繪出某種內部邏輯連貫的障礙自我呈現（Bamberg 2004）。

2015 年我發了一份問卷於公開臉書社團「公「聽」並觀，「障」義執言－聽障者權益論壇 Deaf and HOH forum Taiwan」，以「聽障者日常生活調查」為標題，內容包括「是否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問卷調查結果可作為本研究訪談法的對照。47 位填答者中，有 36 位表示自己有被誤認經驗，比例上為 76.5%，且約有差不多比例的填答男性（73%；N=15）與女性（78%；N=32）有相關經驗。

	誘發敘事組	自發敘事組	總計
受訪者提到 被誤認的經驗	14 人 (7 男 7 女)	8 人 (0 男 8 女)	22 人 (7 男 15 女)
受訪者沒有提到 被誤認的經驗	5 人 (1 男 4 女)	10 人 (7 男 3 女)	15 人 (8 男 7 女)
總計	19 人 (8 男 11 女)	18 人 (7 男 11 女)	共 37 人 (15 男 22 女)

表 1、訪談法的資料輪廓

透過問卷法得到的結果與訪談法中的「誘發敘事組」有比較基礎，皆為研究者主動誘發陳述相關經驗。如表 1，「誘發敘事組」的 19 人中，有 14 人表示有因為口音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比例為 73.7%，與問卷法得到的比例相當接近。「自發敘事組」的 18 人中則僅有 8 人表示曾因為口音而被誤認為外國人，比例為 44.4%，遠遠低於「誘發敘事組」。為了排除這個差異是恰巧「誘發敘事組」的受訪者擁有「較淡」的聽損口音，我將受訪者依照「口音是否牽涉能區辨語意的語音差異」分為「是 / 否」兩組，並應用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到資料上。自變數為性別、敘事分組以及口音分組。結果顯示，整體來說，男性與女性並沒有哪一方較容易擁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口音牽涉區辨語意的語音者，較容易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 $z=2.91$, $p=0.003$ ）；並且，在控制了前述變量後，「自發敘事組」仍然顯著地較少受訪者提及自己有被誤認的經驗（ $z=2.25$, $p=0.02$ ）。

從量化分析所得之資料輪廓來看，當研究者不主動詢問是否有身份誤認經驗時，並沒有那麼高比例的聽障者會提及自己曾被誤認。換言之，儘管約有 73-76% 的聽障者有被誤認經驗，卻沒有這麼多人會在敘說障礙經驗時，主動揀選身份誤認經驗進入障礙敘事中。相反地，必須透過研究者設定此經驗為障礙相關經驗，大部分有此經驗之受訪者才會多少談論。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不需要討論聽障者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或者意謂這不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若我們觀察性別的分佈，會發現「誘發敘事組」的 8 位男性有 7 位表示有誤認經驗，比例相當高。這一組唯一沒有誤認經驗的男性是阿凱，阿凱的聽力

損失未達法定身心障礙程度，他的口音也與聽人口音無異。相較之下，在「自發敘事組」的7位男性完全沒有人主動提及被誤認經驗。不同於男性受訪者，無論是誘發或是自發敘事，女性皆有六至七成的受訪者提及被誤認經驗。敘事組別對於女性受訪者的影響似乎遠不及敘事組別對於男性受訪者的影響。無論是否由研究者主動詢問，女性受訪者均傾向談論自己的身份誤認經驗。亦即，似乎對於女性聽障者而言，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在主觀意義上更具談論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深入不同性別聽障者討論此經驗的敘事內容，探討為何會有如此性別化的資料輪廓。

四、敘事分析

（一）男性聽障者：身份誤認與聽力障礙的斷裂

提到自己有被誤認經驗的七位男性聽障者全為「誘發敘事組」的受訪者。沒有「自發敘事組」的男性受訪者主動提及身份誤認經驗。因此，在這一小節看見的敘事，皆為針對研究者「是否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之直接回答。

張伯（62歲，2014年訪談）自幼年便是聽損，他指出從年輕便時常被誤認為「香港僑生」，然而自己的父母卻都是上海人：

但是其實我的爸爸媽媽是上海人齣，我沒有上海腔調，我反而有廣東腔調，所以有不只一次有人認為說，欸？問我是不是，大學的時候，問我是不是僑生。或者說以後、現在啦也問我是不是華僑啦？香港來的啦什麼，但我也曉得這個口音為什麼會這樣來，反正就不是很標準啦，國語不是很標準，呵呵。[...]（我：那你的反應是什麼？）我沒有反應，我說奇怪啊，我也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子。（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張伯本身並不清楚自己的口音「為什麼會這樣」，亦即，張伯不理解為什麼聽力損失會讓他有香港口音。儘管在他的認知裡，「香港口音」表示「不標準的國語」，他也不以為意。在這段敘事裡，張伯反而將重點放在父母的上海籍貫，而自己卻沒有上海口音這件事上。對於張伯而言，被誤認為異地人的經驗並不是構成其聽損主體經驗的重要成分。

維飛（22歲，2014年訪談）的華語口語屬於光譜上聽人較無法理解的一端，因此維飛指出，剛上大學時，他不是因為「口音」被誤以為是外國人，而是對方以為他在說粵語或日語，完全不是在說華語，所以誤認他為香港人或日本人：

印象中好像有，他以為我說日語... 粵語--，被誤認香港人和日本人，阿太久了，忘光光（我：那你覺得開心嗎？）阿，只是尷尬的吧，沒有這麼開心（我：被當外國人不開心）沒有，只是尷尬呀，尷尬的，沒有開不開心這樣（我：那你有跟他說你不是？）恩，對，我跟他說，我是台北人，我跟他說我聽不到。⁶

儘管自己說的是華語，卻被聽成完全不同的語言，維飛強調自己不會因此感到開不開心，取而代之的是「只是尷尬」的氛圍，以及「無言」的表情符號。對此，維飛澄清自己是台北人，而自己的口語是因為聽損才會聽起來不同。透過「只是尷尬」，維飛並沒有針對這個經驗做太多的深談，並說自己不記得細節，這樣的事情已經很久沒發生，因為自己上了大學後不像在高中時跟同學比較熟，大學修課的模式讓他跟同學比較疏遠，所以他通常保持「低調」與「安靜」。在敘說此經驗時，維飛並沒有將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框架為使其不說話的原因之一；而是強調自己因為不習慣大學生活，所以與人少有交流，使得被誤認的經驗不再發生。

阿偉與松鼠儘管皆有被誤認經驗，但並沒有太在意。阿偉（30歲，2019年訪談）在訪談時為廚師，他說自己常被誤認為「外勞」，但他認為除了口音之外，也因為那間餐廳有很多東南亞員工，所以他面對被誤認的經驗不以為意，被誤認的當下也沒有特別反應，甚至不會澄清。松鼠（2019年訪談）則表示自己這輩子只有一次被誤認的經驗，在網購面交時，對方以為他是中國人。松鼠指出，通常除非他主動問朋友自己講話有沒有哪裡不一樣，對方才會開始認真去聽出差異，否則一般來說，聽人並不覺得他說話有哪裡不同。

相較之下，佐佐跟振宇對於被誤認的經驗有較多著墨，但在敘事的調性上也都偏向正面看待。佐佐（37歲，2019年訪談）有多次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歷。

6 跟維飛的訪談是透過臉書私訊，在此我保留維飛使用的表情符號，並加上標點符號。

airiti

他提到自己有時騎機車會被警察臨檢，他告訴警察自己是台灣人，可是警察不相信，他便說自己會唱國歌還會背總統有誰，隨後解釋自己聽不到，警察便會離開。在談論這樣的經驗時，佐佐用開玩笑的語氣，提到被警察誤認為外國人比較危險，因為「警察很兇又有槍」。佐佐也說，年輕的時候，平常被誤認為外國人，自己會假裝是日本人糊弄過去；年紀漸長後，因為自己在國際化的大學裡工作，就不覺得怎麼樣，「平常心笑笑而已」。他將國際學生當成「一種保護色」，因為如果被誤認為國際學生，學校裡的人就不會「對你口音怎麼樣有太多反應」。亦即，同樣都是被誤認或佯裝為外國人，年輕時的佐佐確實是利用日本人身份來掩蓋聽障身份；而對於現階段的佐佐而言，國際化環境中口音紛雜是常態，佐佐不再需要面對針對他身份進行詢問的污名管理情境。

振宇（24歲，2020年訪談）常被誤認為香港人，面對這個狀況他會跟對方解釋自己是台灣人，是因為聽損所以口音才不同。他說，一開始當下難免會覺得「自己的口音真的有那麼不同嗎？」，但久了之後他對被誤認經驗的理解逐漸改變：

我自己之後會把它當作一個笑話來講，就不會特別在意這件事，而且被認成香港人我也覺得蠻開心，因為我還蠻喜歡香港的（我：為什麼那麼喜歡香港？）就我在網路上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們給我印象就是友善的，就香港對台灣是比較友善的，然後再加上，他們最近的事件讓我感到香港人的韌性跟團結，就覺得他跟我們是一樣的人，這樣的感覺。（**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振宇在這段敘事中，將被誤認為香港人的經驗「當作一個笑話來講」，顯示他並不因為身份誤認而重新理解自己的障礙身份。這裡可以觀察到，香港人身份本身並沒有讓他正面看待聽損口音，而是因為高頻率的身份誤認經驗使其不再「特別在意」自己的口音。振宇並未選擇佯裝香港人，亦即，香港人身份未被挪用為去除污名情境之指標，也沒有因此讓他給予聽損口音正面的象徵價值（對比「自發敘事組」女性受訪者安妮）。因為個人交友網絡加上地緣政治的親近性，振宇敘說出一種香港身份的地緣政治浪漫性，進而製造出某種誤認經驗的緩衝地帶，讓誤認經驗本身得以經過個人的重新理解後，不成為具社會心理傷害性的日常事件；然而，這個重新理解的過程似乎與聽障身份並無太大

關聯，振宇僅就誤認經驗作出評價，而並未透過誤認經驗去闡述聽力障礙對自我認知的影響。

威廉（28歲，2020年訪談）同樣被誤認過為香港人，也被誤認過為馬來西亞人、日本人和中國人；而對於被誤認為中國人，他相當不高興：

對啊，之前有人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說不是，他就跟我說：「你口音聽起來就像中國人啊。」我說我真的不是欸，然後還來來回回好幾次，我就很生氣，我就直接拿身份證給他看，我就不是中國人[...] 因為我覺得對方太白目了啊，對啊，而且我那時候沒有很喜歡中國人，所以被當成中國人讓我很不爽。（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由於威廉是男性受訪中唯一對於被誤認身份表示強烈不滿者，我便詢問他：「是否會因此告訴對方自己是聽障者？」他回答：「我不會想解釋，因為我覺得干你屁事啊」。令人意外地，即便是被誤認為自己不喜歡的國族，威廉也沒有揭露聽障身份的舉動。然而，這似乎並非因為他認為聽障身份比起中國身份會創造出更嚴重的污名情境，而是因為誤認者在社會互動上的不禮貌（「太白目了」），讓威廉不認為自己有必要對不合乎社會規範的誤認者提及自己的聽力損失。

此外，對比振宇的經驗，威廉的這類誤認經驗本身沒有製造出曖昧的緩衝地帶，而是因為地緣政治上的厭惡感，直接了當地對其造成負面作用。與振宇的敘事雷同的是，即便這種認同經驗對威廉產生社會心理上的直接傷害，他並未因此反身思考聽力損失如何造就如此不悅的誤認經驗，或是談論他怎麼因此重新理解障礙身份。

綜合上述七位男性聽障者的敘事，可以發現他們談論身份誤認經驗時，傾向孤立身份誤認經驗於障礙敘事之外：有不以為意者，或甚至視為笑話看待。這七位男性聽障者的敘事皆產生自「誘發敘事組」，可以見到在敘事上，他們的身份誤認敘事與障礙身份敘事並無以互相連結的形式闡述而出。

（二）女性聽障者：纏繞聽力障礙的身份誤認經驗

十三位有被誤認經驗的女性聽障者，展現出較多樣的敘事，由於篇幅所限在此無法全數仔細討論。為了方便呈現訪談結果，此小節的書寫亦根據研究設

計區分為「誘發敘事組」與「自發敘事組」。

1. 誘發敘事組

整體而言，誘發敘事組的七位女性受訪者，大部分呈現類似男性受訪者的敘事：她們專注在回應訪談問題「有沒有曾經被誤認為外國人過？當下的反應是什麼？」，而比較不傾向概括地針對這類經驗對其障礙身份之影響做討論。譬如，Q 姐（36 歲，2018 年訪談）針對自己就學期間被誤認為僑生的經驗，指出自己的反應通常是會澄清自己是台灣人且有聽損；然而，Q 姐並沒有談論身份誤認經驗對理解自身障礙身份有何影響。類似的狀況也見於另一位受訪者麥脆ㄣ（22 歲，2018 年訪談）——她在台北捷運被搭訕，對方問她是不是日本人，但她主觀上不確定是因為口音或是穿著而被誤認。儘管麥脆ㄣ沒有排除口音因素，但並未專注於聽損口音的因素，僅提到「可能覺得我不像（台北人）」，沒有多加描述身份誤認經驗會如何回饋到障礙身份認同，也沒有將其視作負面經驗。

相較之下，面對訪談問題，有兩位受訪者將身份誤認經驗連結至聽力障礙：小魯（31 歲，2018 年訪談）與小凡（19 歲，2018 年訪談）。小魯的口語屬於光譜上聽人較難以理解的一端，她說自己有時會被以為在說外國語言，因此對方直接用英語跟她說話，她會反過來跟對方說：「你可以跟我說中文。」有時像是面對店員，她則直接乾脆付錢就算了，不多加解釋。小魯指出，澄清自己是聽障者並不會換來比較正面的結果：有一次她到屏東滿洲去賞鳥，向一位阿嬤問路，不料對方馬上問她：「越南？菲律賓？」小魯回答自己是台北人。阿嬤並不相信，說小魯講話不像台北人。小魯只好告訴對方自己是聽障者，孰料此話一出，阿嬤一言不發直接走掉。她的理解是屏東的老人家比較「保守」，所以不知道聽障者會說話。不過，就小魯的經驗而言，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很多聽人都不知道要怎麼跟聽障者交流，儘管在揭露聽障身份前，雙方都還在自然對話，但一旦揭露聽障身份，對方可能立刻中斷溝通。換言之，在小魯的敘事裡，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直接回饋到她對聽損身份的理解：聽損身份的揭露是導致雙方對話嘎然中斷的直接原因，因此，面對被誤認為外國人的情況，她思考的並非誤認為外國人這個事件本身，而是進行污名管理——衡量相較於被當作外國人，揭露聽障身份是否會使自己暴露於更不利的污名情境。

類似的敘事也見於小凡。小凡指出自己有時會被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通常她會直接否認，但也不會直接揭露聽障身份。小凡解釋自己的考量，提到「有點面子的問題，不想讓人家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被知道，小凡也不會不承認自己是聽障者。她知道自己的口音「跟台灣人非常不一樣」，也指出她曾經向語言治療師反應這個問題，希望改善。不過終究「沒辦法去模仿他們台灣人的口音」（**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並認為「台灣人口音是聽人才可以去學習到」。在這段敘事裡，小凡將台灣人論述為他者，而非自己所屬的群體，顯示在障礙者的生命經驗中，當「台灣人」作為同質群體描述時，障礙者是與此同質性不相容的他者。身份誤認經驗可能強化了這樣「被排除於所屬群體」的自我認知。

被誤認經驗也強迫小凡面臨污名管理的抉擇時刻：當被誤認為外國人時，揭露自己的聽障者身份可能會讓她「沒面子」。在小凡的敘事裡，聽障者並不如日本人或韓國人的身份擁有較優越的象徵資本（Bourdieu 1991）。為了不讓自己沒面子，小凡甚至會以被誤認的身份撐完整個對話：

我之前被櫃姐以為是日本人，她就一直問我日語問題，我就一直裝傻不回應，因為日語我不懂嘛。當下很想逃跑，但沒有說是台灣人，因為被當成日本人還滿有趣的，後來就聽她講完就走了。（**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在這裡可以見到小凡選擇佯裝成日本顧客，即便面臨「很想逃跑」的壓力，需要用聽不懂店員的問題來表演「裝傻」，也不願意在百貨公司專櫃這樣的場域裡，揭露自己的聽障者身份。「面子問題」常見於身心障礙者的自我認同敘事中，比如輕度智能障礙學生覺得到特教班上課沒面子（林惠芬 2004）；手汗症患者認為初次見面握手時有手汗沒面子（吳雅琴、陳宇嘉 2011）。在台灣承襲的「面子文化」裡，「面子」強調的是個人依存於社會評價的自我形象問題，個人形象是否具有優越性（prestige）係仰賴於社群對於理想社會形象的理解（Mao 1994）。這些「面子問題」直接揭示了非規範身體（non-normative body）並不符合理想身體之社會想像。在小凡的例子裡，聽障身份可能在面對象徵時尚、販售理想身體形象的百貨公司專櫃場域時，因其受污名狀態，顯得不得其所（out of place）（Kitchin 1998）；相較之下，日本人身份似乎比較適

合這樣的場域。與男性受訪者如振宇及威廉不同，小凡在敘說誤認經驗時，是緊扣著障礙身份來討論，而非僅聚焦被誤認為日本人本身是否是愉快的經驗。

在以上兩位女性受訪者的敘事裡，都可以見到國族身份與聽障身份是以同時出現但互斥的對立狀態：一旦揭露自己是聽障者，因為雙方都是台灣人，談話的焦點就會放在聽障身份上，而不是凸顯自己不是外國人；又或者，似乎沒有任何可能讓對方認為自己是來自外國的聽障者，一旦被認為外國人，那麼便一定是來自外國的聽人。也就是說，在身份誤認的敘事裡，聽障者面臨的選擇表面上看起來是「外國人／台灣人」這組身份，但事實上是面對「外國的聽人／台灣的聽障者」的對立關係。

「外國的聽人／台灣的聽障者」的對立關係直接延伸出兩條象徵資本的身份軸線：聽人與聽障者的象徵資本進行競爭；外國人與台灣人的象徵資本進行競爭。然而，儘管在健全主義（ableism）的社會結構下，聽人身份通常較聽障者身份擁有更多的象徵資本；在台灣的種族主義結構下，外國人身份並不永遠較台灣人身份擁有更多的象徵資本，種族化的階層秩序製造出某些國族身份（白人、東北亞）優於其他國族身份（東南亞）的社會秩序（藍佩嘉 2005）。下面的小節能更清楚地看出這個面向的象徵資本競奪。

2. 自發敘事組

「自發敘事組」有八位女性受訪者主動談到自己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這些受訪者皆是在談論聽覺障礙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時，主動提及身份誤認經驗。她們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身份誤認經驗來輔助障礙敘事。有兩位沒有太在意身份誤認經驗，比如 Peiyu（18 歲，2018 年訪談）指出自己曾被中國學生誤認為陸生，她只是告訴對方自己不是，但沒有覺得怎麼樣，並說「反正我就是聽障，我沒有很 care」。在這一小節裡，我將焦點放在其他六位對誤認經驗有較多討論者，凸顯詮釋外國口音的多樣敘事。

(1) 外國口音顯示身體損傷

第一種敘事是將外國口音視為聽力損失作為一種負面存在的體現。不論聽人怎麼看待外國口音所連結之國族，對於聽障者而言，外國口音的詮釋本身便象徵著生理損傷的「嚴重」——如果聽力損失不嚴重，何以聽人會以為自己是

外國人？

小薇（33歲，2020年訪談）是高雄人，買飲料或搭計程車時，常常被問是不是外國人，因此常常需要解釋自己是聽障。小薇說：「我是不會怕要去講自己是聽力障礙，是要一直講，覺得有點煩。」因此，有時對方問她：「小姐你是不是外國人？」小薇會說：「我是台灣人我只是有口音。」或是「我是土生土長的高雄人。」懶得去跟一個陌生人解釋那麼多。談論這樣的經驗時，小薇有點激動地說：「我明明就是高雄人，我在高雄買個飲料還要問我這個問題，我就很怒！」這顯示身份誤認經驗直接對小薇造成社會心理上的危害。

小薇進一步指出，當有人問「你是哪裡人」，這只是一種「包裝」，言下之意便是你的「口音很重」，基於禮貌用這種方式問而已。亦即，只要聽人因為聽到口音而詢問自己是哪裡人，對於小薇而言，這個問題本身便會讓她進入一種污名情境。並且這個污名情境不只是自己內心的解讀，誤認者本身也有指出「口音很重」的意圖。佯裝為外國人與否並非小薇所考慮的，因為她認為雙方早已有自己並非外國人的隱晦共識。這使得在小薇的敘事裡，外國口音完全不能作為去除聽障污名情境的指標；反而是在在地提醒她，自己的聽力損失已嚴重到影響日常生活的歸屬感。

這種敘事不單純只在自我認知的社會心理層面上發揮作用。在一些例子中，身份誤認作為負面身體障礙的敘事，甚至能進一步推動障礙者尋求醫療介入，肉身地改變自己的身體。以聽障者來說，便是尋求人工電子耳植入。人工電子耳是侵入性醫療，不同於助聽器外在於身體且單純放大聲音，人工電子耳透過外部接受器與連結到耳蝸的皮下植入體，將聲音訊號轉換為電訊號傳送給聽神經。在醫療論述上，人工電子耳被形塑為強大有「治癒」聽損的科技物（林韋成 2019）。本研究的受訪者小君與瑪姬在討論人工電子耳植入後的成效時，將外國口音視為聽力損失導致之障礙，並用外國口音的消弭來證明人工電子耳的有效性。

小君（39歲，2014年訪談）是單耳電子耳使用者，她在部落格中寫到，因為她在日常生活中被誤認為東南亞移工的頻率愈來愈高，她開始考慮要植入第二耳的電子耳，希望能夠藉此改變她的「東南亞口音」。由於小君對於第一耳電子耳的成效很滿意，所以她相信雙耳電子耳將能夠幫助她擺脫東南亞口音。

小君是透過被誤認的國族身份來評價自己的「聽損口音」。她指出，她聽過東南亞移工的口音「很不標準」，所以她不要這樣的口音。然而，面對我詢問若是她被誤認為日本人，她會有什麼反應，只見小君曖昧地笑，似乎不排斥自己被誤認為日本人。因此，這裡的關鍵並不在口音「不標準」，而是「怎麼樣的不標準」。儘管不能相提並論，對於小君而言，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社會受到的歧視並不亞於聽障者受到的歧視；在她的敘事裡，被誤認為東南亞移工承受的污名狀態，可能與聽障承受的污名狀態不相上下。

小君指出，某日她與姊姊帶生病的母親出院，在計程車上，她坐在後座陪著母親，姊姊坐前座跟司機聊天，司機因而認定小君為家庭移工。小君回答司機，說自己不是移工，「只是因為太累了，媽媽的腳又在痛，所以才不說話」；此時其口音讓司機更加認定小君是移工，因而對小君說：「你會說中文啊？可以跟我們一起聊天呀！」或許是因為認知小君為移工，司機完全掌控了對話的主導權。

據小君的說法，平常她會不厭其煩地向對方解釋自己的聽損身份，說自己是「正港的台灣人」（台語），不過因為她太常被誤認，加上當天很累，所以懶得再反駁，於是之後都沒有再說話，默默以移工的身份完成車程。就小君所述，這個事件成為讓她堅定要改變自己口音的關鍵事件。換言之，聽損口音的不可欲，並非因為其本身的語言特徵與聽人的標準口音不同，而是經過評估後，聽損口音引發的被誤認身份，可能承受更嚴重的污名情境。對小君而言，這樣的狀況來自於聽力損失的生理狀態，要脫離這種被誤認為東南亞移工的情境，便需要從身體去做根本性的改變。

瑪姬（27歲，2020年訪談）提供了類似的敘事。在瑪姬談到自己動電子耳手術的動機時，她提到口音是原因之一：因為高中開始就讀啓聰學校、學習台灣手語，使用手語的比重逐漸高於口語，瑪姬的家人發現她開始出現愈來愈重的聽損口音，其中最受到注意的便是連結到中國人身份的過度捲舌：

然後講話就越來越少，就對我來說不是好的徵象，是退化的徵象，對，那我就都不講話，那我家人就覺得說，你講話怎麼就是……我那時候以前沒有被說我是外國人，我就到了高中之後，然後有人問路，然後就說那邊怎麼走這樣子，然後問路的就說：「你是不是外

國人啊？」我就說我不是，我才發現說我的發音是不對的。我就問老師啊同學阿，說我這樣發音對嗎？我為什麼講話會被以為是外國人？他說：「你的捲舌音比較重」[...] 後來我就去開電子耳嘛，我就去做語言練習，說那個ㄅ阿什麼的，就不用捲舌。（**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捲舌音是聽損口音的特徵之一，而在聽人的認知中，捲舌是中國（北方）口音的華語相當明顯的特徵。儘管並不是所有聽障者都有過度捲舌的語音特徵，但本土特殊教育文獻中（歐子瑩 2020），也提過一位女性聽障者因為過度捲舌被誤以為是中國東北人。因為她不樂於揭露自身的聽障身份，但如果佯裝為中國人，在與人互動時，又會遭遇一連串自己本不該面對的兩岸政治問題。這位聽障女性認為台灣人相當排斥中國人，這讓原本就對聽障身份自卑的她更加排斥自己的聽損口音。相較之下，雖然瑪姬沒有對於中國人身份作出評價，但是顯然地，在瑪姬的敘事中，外國口音象徵某種身體的「退化」，而這種「退化」是不可欲的，需要透過醫療手段（電子耳植入術加上語言治療）消除；在此，外國口音回饋到瑪姬的障礙身份認知上，在醫療論述中強化了聽力損失作為一種負面身體狀態的社會認知。

(2) 外國口音作為消除障礙之指標？

據上所述，當被誤認的身份在台灣社會並不是優勢身份時，可能使得障礙者對自己的身體狀態產生負面認知，誤認身份因而不具有消弭污名狀態的社會互動功能。那麼，如果被誤認的身份夾帶強大的象徵資本，理論上能夠成為消除障礙的指標（disidentifiers）。有別於視外國口音為凸顯聽力障礙的小薇、小君與瑪姬，安妮（25 歲，2020 年訪談）相當正面看待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

在上大學之前，安妮因為對聽障身份有某種程度上的「自卑」，害怕開口便被認出來是聽障者，而不太喜歡開口說話。然而進了大學後，安妮發現有許多學業優秀的聽障學生並非以「身心障礙者」來認知自己，而是傾向以「耳朵受傷」來理解自身，這使得她開始對障礙身份的理解亦有所轉變。換言之，對於安妮而言，比起將障礙者視作自我的身份認同，醫療化的損傷論述更能描述她對於聽力損失的感受。

在國際化的大學裡，安妮更發現大部分的人聽到她說話，第一反應以為她是外國學生，這讓她開始有自信開口說話：

很多外籍學生，他們中文發音也不一定很好啊。那我在報告的時候有些人會覺得說：「欸你是外籍學生。」他們不是用身心障礙者，對身心障礙者的那個認知去看待你。久了之後就覺得說，哼，口音不一樣，那聽起來像外國人而已。對，也也不用太擔心說，我的口音不好，然後不開口講話。對就是慢慢一直調整，一直嘗試。然後到我現在，我就覺得說，我聽力障礙者那又怎麼樣？呢我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只是可能沒有那麼好這樣子。（**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被誤認的經驗回饋到安妮對自己聽損身份的認知。儘管在安妮的敘事裡，聽障身份仍然是次於聽人身份（如「只是可能沒有那麼好這樣子」），但在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上，外國學生的誤認經驗讓聽損身份「拉抬」到了與外國人類似的社會位置，就算不標準，聽障者產出的口語至少是某一種聽人（「外國人」）說話的樣子（「聽起來像外國人而已」）。在安妮的認知中，外國學生的身份直接讓聽損口音得到了某種優越的象徵價值（對比於「誘發敘事組」的男性受訪者振宇）。聽損口音從受損的負面存在轉變為外國口音的中性甚至正面的存在。男性受訪者的佐佐，提及大學裡國際化的環境讓他將口音多樣性作為其不需去意識到自己有聽障口音的「保護色」。不同於佐佐，安妮則是將大學裡的國際化環境敘說為一種讓自己得以重新理解聽障身份的場域。

從障礙研究的角度來看，「治癒」本身牽涉身體類別的跨越（crossing），而這種跨越並不一定需要生理上的轉變；在安妮的敘說裡，身份誤認讓非涉生理轉變的身體類別跨越發生，而當跨越成為日本人，損傷同時也得到了治癒。甚至，有一次，安妮在捷運上被一位陌生男性搭訕：

他問說：「你是不是日本人？」然後我就突然想要開玩笑，我就：「啊對欸，你怎麼知道？」他覺得聽我的口音不像台灣人，我就：「喔對啊，因為我來台灣沒多久，然後中文發音還不標準。」對，然後就是還真的就聊聊聊，對，所以他完全看不出來我是聽障者 [...] 對然後他就會覺得就很有趣，你就很有興趣聊下去。對，有時候我也會讓對方知道說我的身份，然後對方通常大家就是：「啊不好意思

思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然後通常他們會以為聽障者不喜歡聊天，所以我就會先跟他們說：「沒關係，沒關係，我不介意。」（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當對方知道安妮其實是聽障者時，因為對方中斷對話（認為聽障者不喜歡聊天）而讓安妮無法經歷到自然交談的經驗。相反地，透過佯裝為日本留學生，安妮體驗到了真實的搭訕經驗，並且是她正面看待的經驗。

安妮之所以正面看待誤認身份，是因為在誤認的當下，障礙得到了治癒。具體而言，面對聽損口音的異國性，安妮的看法並不完全符合高夫曼所稱的「去除障礙的指標」（disidentifier）。關鍵在於，安妮的敘事邏輯與前述的「佯裝」（passing）並不同，安妮並沒有要隱藏障礙身份。高夫曼的污名管理，強調的是不讓污名特質現身，避免自身進入受污名情境。先前的受訪者比較被誤認的國族身份與障礙身份的污名特質，進而評估是否選擇佯裝為外國人，或是現身為聽障者。而安妮的敘事不同，她先是強調聽力損失不過是「耳朵受傷」，再談到聽損口音時，無論是在大學中重新理解自己的聽損口音是「像外國人而已」，或是先「覺得很有趣」順著對方說自己是日本人，隨後現身為聽障者，都顯示安妮並無意在社會互動中去除聽障特質。

韓國的障礙研究學者金恩貞（Eunjung Kim；音譯）（2016）指出，障礙的「治癒」在概念上仰賴著「復原」（rehabilitation），復原在邏輯上是指回復到自己過去的狀態；然而，對於先天障礙者而言，自出生開始，便未曾擁有過那個「過去」。換言之，先天障礙者面臨治癒的身體想像時，其實是以他人（健全者）的身體為範本，將他人的「當下」當成自己的「過去」。治癒的邏輯，便是仰賴建構出這樣的「過去」，並將這樣的「過去」形塑為障礙者可以追求的「未來」。而障礙者的當下，隱身在這樣的治癒想像中，這種將「期待的未來」寄身在「想像的過去」的文化邏輯，金恩貞稱為「折疊時間」（folding time）（Kim 2016: 11）。

在此，安妮的敘事呈現了不同的治癒邏輯：安妮並不需要透過語言治療來「復原」某種自己不曾擁有的「過去」（亦即台灣聽人的口音）；取而代之的是，安妮本身「不標準」的口音因為被誤認為國際學生或日本口音，讓安妮的身體在轉瞬間成為了他人當下的身體，進而得到較高的象徵資本。除此之外，因為

airiti

實實在在地用被誤認的異國身體活了一次，安妮甚至能反身地重新詮釋聽障口音的象徵資本，翻轉聽障口音的負面意義。在此，治癒之所以可能，並不是將還未發生的未來，寄託在不曾擁有的過去。若是用折疊時間的角度觀之，是兩種人生的平行時間彼此互相疊加——外國人的當下折疊到聽障者的當下——轉變了聽障者當下身體的社會意義。因此，聽障者得以現身。

(3) 混合的敘事

貝拉（33歲，2020年訪談）的敘事同時雜揉了外國口音的上述兩種詮釋。貝拉本身是特教老師，在談到自己從小學時期到現在出了社會的轉變時，她提到自己的「發音退步了」：

因為我在國小的時候，我沒有什麼口音，跟正常人沒什麼 - 分不出來，然後開始慢慢的，因為你的語言一直不練習，因為我聽……因為助聽器會一直換，所以我可能聽不太清楚說我發音有沒有問題，結果就慢慢的發現欸你好像口音怪怪的，但是我已經分不出來我是哪一個音已經……沒有練習了。

從「沒有什麼口音」和「與正常人分不出來」，轉變到「口音怪怪的」，口音的出現對於貝拉而言是意味著自己愈來愈偏離規範身體（normative body），而面對許多人告訴他「口音怪怪的」，貝拉提到自己的應對策略：

如果我不想認識他，我就說喔我國外回來的，不然怎麼辦，嘿啊，那如果覺得欸這個人還可能以後會認識的話，我會直接主動說喔因為我本身是耳朵不好，或者是我是聽障這樣子。

貝拉指出，會有這樣的策略，是因為自己時常被誤認為外國人，而面對身份誤認，「一開始會覺得很難過」，因為這顯示了聽力障礙的惡化；不過久而久之，她便「就覺得習慣了，就見怪不怪了，因為太多人講了」。因此便反過來採用這樣的佯裝，來應對那些一面之緣的陌生人。換言之，對於貝拉而言，雖然外國口音彰顯了身體的退化，但同時也能作為消弭污名情境的指標。面對人工電子耳手術沒有成人健保補助的狀況下，她也沒想過為了逆轉身體退化而植入電子耳；既然無法消弭外國口音，貝拉遂而適應外國口音的解讀，並使用這種解讀作為處理污名的策略之一。

(4) 幽微的抵抗敘事

最後要談論的受訪者玲玲（25歲，2020年訪談）比較不同。玲玲本身擁有社會學學士學位，因此她指出，受到社會學訓練影響，她秉持「客觀中立不帶偏見」的觀點來理解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不論被誤認為哪一國人，她都不以此悲喜。甚至，玲玲認為作為聽障者，每一次糾正聽人的誤認並現身為聽障者，有助於聽人認識聽障者的存在，也能糾正聽人社會裡的種族歧視結構，讓聽人不以口音可能連結到的種族身份評斷他人。在玲玲的敘事裡，不同於其他受訪者，是玲玲掌握了被誤認情境中的主導權：

因為有些司機，他可能看你上車，聽你講話之後，他就覺得你好像是外國人，然後他就會有一點怕怕的，不想跟你講話。然後我就會還要主動跟他說：「司機不好意思，因為我是聽障，所以我口音就點不一樣，所以你不用害怕，如果你想跟我講話的話。」

玲玲提到，因為膚色偏黝黑，自己不會被誤認為日本或韓國人，而是被誤認為來自中國南方、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因此，當玲玲認為司機可能以為她是外國人時，她很清楚知道司機把自己當成在台灣會受歧視的一類外國人。在玲玲的敘事裡，「你不用害怕」這樣的話語，其實充滿著反抗張力，掌握了對話的主導權，同時挑戰了聽人對於某些地方來的外國人不願互動的種族主義，也翻轉了聽人／聽障者之間既有的權力結構。無論玲玲是否真的會這樣面對司機，但在研究訪談這樣的場合，玲玲確實以這樣的方式來討論誤認經驗，相較於其他受訪者，這是較為挑戰歧視結構的敘事。

五、性別化的誤認經驗敘事

在本文多樣的敘事裡，聽損口音本身作為符號載體（sign-vehicle），並不是穩固地象徵特定不變的客體（object）；相反地，符號與客體間的象徵關係必須仰賴於特定時空與社會脈絡中符號與客體的共現，此為符號與客體間的指向性（indexicality）（Ahearn 2016 [2020]）。指向性的解讀因人而異，受到複雜的個人社會背景所影響（Calder 2021）。對於語言學者而言，聽損口音指向了聽力損失這一生理差異；對於不熟悉聽損者的聽人而言，因為結構性的無知，使得這個口音指向了異國身份。在本研究中，對於聽障者而言，我們見到聽人

airiti

的解讀本身成爲了另外一個符號：比如，張伯便毫無頭緒這樣的身份誤認到底指向了什麼，甚至反思自己的上海籍貫爲何會讓他有香港口音；小君與瑪姬則是認爲外國口音的解讀本身便指向了正在發生的身體退化，顯示聽力損失正在加重；對安妮而言，外國口音的解讀反而指向了「雖然不標準但頂多像外國人一樣」之某種國際學生擁有的象徵資本。

在本文一開始，從高夫曼的污名管理理論出發，我討論了理論上外國人身份應可作爲去除障礙污名情境之指標，然而實際上，許多本文中呈現的受訪者並沒有這樣運用外國人身份，很大部分取決於聽力障礙導致的污名情境，以及外國人身份導致的污名情境之間的對抗。受限於台灣社會對於不同種族／國族排序之象徵資本階層，白人與東北亞外國人才會佔據較高的象徵位置；相較之下，因爲地緣政治與種族主義，中國人或東南亞國家人士則不被視爲可欲的國族／種族身份。這些階層化的族群秩序直接映射到了台灣社會對不同外國口音華語的評價，譬如美國華裔口音的華語會得到優於東南亞口音的華語。本土的實證研究指出，當台灣受試者聽到來自歐美口音的華語，即便錄音檔中的歐美口音說話者比東南亞口音說話者的口音來得「更重」（更難懂），受試者仍然給予前者更高的評價，認爲前者更可能是從事文職且具高教育程度（陳淑杏 2013）。由於膚色的關係，台灣聽障者不太可能被誤認爲白人，使得僅有在被誤認爲日本人或韓國人時，身份誤認才可能成爲去除污名情境的機會。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美國華裔的華語口音在台灣社會能見度高（比如許多流行歌手有類似口音），但本研究的受訪者沒有人曾被誤認爲在歐美長大的華人，這可能因爲聽損口音在聲學特性上與美籍華裔口音（譬如華語的ㄉ、ㄒ變成英語的 <ch>、<sh>）不太相似。

身份誤認成爲一種「去污名機會」的詮釋，並不是一體適用於所有聽障者，至少在本研究中，即便對方沒提及被誤認的國族，僅用「哪裡人」或「外國人」這樣的泛稱，對於聽障者而言也可能是強調身體損傷之存在或退化的傷害性行爲（例如小薇與貝拉）。此外，佯裝爲外國人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是一面之緣，除非能像安妮一樣應對自如，否則可能是像小凡的例子，佯裝經驗令人疲憊且想逃離現場。

本文在研究設計上區分受訪者爲「誘發敘事」與「自發敘事」。在女性受

訪者這一組，發現比起誘發敘事，自發敘事中更能看見身份誤認經驗如何整合進入障礙敘事中，用以敘說障礙自我；相較之下，誘發敘事得到的身份誤認敘事則較為孤立，這可以明顯見於男性受訪者的敘事中。這具有訪談方法論上的啓示，研究者明白詢問受訪者是否有某種經驗時，可能反而讓受訪者過度專注於直接回答該問題本身，而錯失受訪者從更廣大的生命經驗歷程來理解該經驗的敘事可能性（當然，並不是每一位受訪者皆如此）。

本研究另一個重點是性別化的身份誤認敘事。與上述的方法論啓示有關，七位「自發敘事組」的男性無一人主動談論身份誤認經驗，這可能說明了身份誤認經驗確實對於男性聽障者而言，主觀上不那麼影響他們對自身障礙身份的理解；換言之，在「誘發敘事組」男性觀察到的，身份誤認敘事與障礙身份敘事高度脫鉤的現象，可能在男性聽障者間具有一定代表性。外國人身份成爲去除污名情境之指標的可能性，因此也不那麼明顯，因爲在身份誤認經驗與障礙身份脫鉤的敘事中，男性受訪者幾乎沒有從聽障污名管理的角度來理解被誤認經驗，即便有涉及污名管理，也是針對國族身份本身的污名進行討論，而未連結至聽障身份（例如威廉）。相較之下，女性聽障者則較傾向從污名情境的角度來討論身份誤認經驗。

回到本文的研究問題，被誤認經驗如何回饋到台灣聽障者對自身身份的理解，從敘事分析來看，關於這個問題，男性聽障者似乎無涉及「如何」，而是被誤認經驗似乎與男性聽障者對障礙身份的理解沒有太多互動；從女性聽障者的敘事來看，儘管當然也有人如同男性聽障者的狀況，但能見到多樣的被誤認經驗回饋到障礙身份認知的途徑。

其一，身份誤認經驗可能會強化聽障者「不得其所」的社會排除感。小魯揭露聽損後，聽人拒絕對話，對比於被誤認爲外國人時得到的自然互動，讓聽障者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被排除感。小凡在百貨公司專櫃被誤認爲日本人後，意識到如果坦承自己是聽障者會「沒面子」，顯示聽障者在特定場域的被排除感。小君需要用台語來證明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操著東南亞口音的移工，但即便澄清，計程車司機也不予理會，這也是一種被排除感。小薇在自己家附近也要被誤認爲非本地人，這種日常的、細瑣的實踐，提醒著她在社會中的「他者」身分。這些出現在被誤認經驗敘事中的「不得其所」敘事，都彰顯被誤認

為外國人的經驗，不僅僅是被誤認這麼簡單而已，而是透過被誤認的社會互動，聽障者不停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不被當下的社會情境預設為「屬於那裡」。

其二，被誤認經驗可能會反過來降低聽障者對於障礙身份的「不適感」。這個途徑比較特別，在諸多有誤認經驗的聽障者中，只有安妮提出這樣的敘事。不僅是建立在既存的對於障礙身份的低度認同，台灣社會對於特定類別外國人（包括留學生）的友好程度，讓被誤認為外國人的這個事件本身能夠賦予聽損口音新的象徵資本，使聽損身份不再那麼被障礙者本身視為某種不可欲的身份。

其三，儘管因為障礙者在健全主義結構下承受極龐大的污名，使得聽障者自身並不如使用手語的聾人社群，會將聽損身份視為某種具群體歸屬感的社會或文化身份，從玲玲的例子，可以看見在適當的培力（empowerment）下，聽障者是可能將被誤認的情境視為讓聽障者現身被看見的抵抗機會。

而回到性別的這個面向，從經驗資料本身，並沒辦法很清楚地看見為何身份誤認經驗與障礙身份理解的互動，幾乎只見於女性聽障者的敘事中。不過，女性主義障礙研究者指出女性障礙者受到來自父權結構以及健全主義結構的雙重且交織的壓迫（邱大昕 2012；郭惠瑜 2020）。單純從性別的視角來看，本土社會語言學研究指出，台灣女性被期待要有「氣質」，而氣質與口語表現緊密連結，譬如女性講話要標準（Su 2008）。比如，在新北市三重某高職做的民族誌研究寫到，男學生會透過講著地方口音來展演某種陽剛氣質，而女學生則是盡可能趨向標準口音以將自己與那些男學生區隔開來（Baran 2014）。

性別氣質的社會評價並不會僅針對非障礙者發揮效用，然而，性別氣質的社會建構是基於健全身體的假設上發展而出，使得障礙者極容易在這套健全中心的性別氣質評價中，無法展演規範性別氣質（normative sexuality）。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可能便是透過性別經驗來對女性聽障者的障礙經驗造成更大的影響。在性別化的生活經驗裡，「講話不標準」對於女性性別氣質的威脅較大；相較之下，對男性而言，「講話不標準」較不威脅、甚至合乎男性陽剛氣質的展演。⁷ 當女性聽障者的口音使其被誤認身份，在反身的自我認知中，聽損口音

7 男性的陽剛氣質通常不來自如口音或裝扮這種身體直接展現出來的中上階層氣質，而是來自於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控制。身心障礙者經驗到的社會經濟排除過程，對其陽剛氣構成威脅，形

的存在得到凸顯，進而驅使女性聽障者聚焦生產此口音的損傷身體。口音生產出種族化的身體，也使得女性聽障者在誤認情境的當下，實實在在地經驗了各種身體會遭遇的處境。若沒有揭露聽障身份，而是以異國身份自居，儘管聽障者知道這些身體不真實也不持久，但透過這些片刻的、偶然生產出的種族化身體，聽障者得以反身思考自己的障礙身體擁有何種象徵資本，讓自己體現出種族化／階級化之性別氣質（譬如：日本女學生、東南亞女性移工……等等）。

要提醒的是，本文分析的敘事是來自於訪談法，訪談法中的敘事不能排除其同時是與研究者進行立場協商的展演（Baynham 2011）。由於研究者為男性聽人，在訪談中所得到的聽障者敘事也需要將研究者的社會身份考量進去，譬如可能因為研究者的性別表現為男性，男性受訪者為了避免有損其陽剛氣質，因而表現得對被誤認經驗不在意（cf. Kiesling 2018）；女性受訪者也可能因為研究者為男性，而未有深入性別化經驗的敘事。此外，因為研究者為聽人，部分受訪者可能因此避免強調聽人作為誤認者對其產生的負面影響，若訪談者亦為聽障者，也許會因共享壓迫經驗而有不同的敘事內容。

六、結論

本研究透過訪談台灣成人聽障者，探討身份誤認經驗是否以及如何使聽障者調整自己對於聽力障礙者身份的認知。透過讓受訪者自發性談論或是研究者主動詢問受訪者的兩種訪談方法，本文揭示不同性別看待身份誤認經驗的不同。即便大多男性聽障者有身份誤認經驗，在訪談者不主動詢問的情況下，這些男性聽障者並不傾向於障礙生命經驗的訪談中，提及身份誤認經驗。相反地，女性聽障者即便訪談者不主動詢問，也傾向主動在討論障礙經驗時，將身份誤認經驗引入訪談中。這顯示，被誤認經驗對於聽障者自我認知的影響，可能是性別化的，呼應了女性主義障礙研究對於性別與障礙交織性的關注。

從高夫曼的污名管理理論為出發點及主要分析框架，本研究發現並非所有的聽力障礙者都以污名管理的角度來看待身份誤認經驗。在聽障者的自我認知中，首先，異國的身份必須緊密與聽力損失相連，才有可能形成「外國聽人／

台灣聽障者」的競爭選項，前者遂能去除後者潛在衍伸的污名情境的身份。再者，被指認的異國身份儘管在人口學意義上是虛假的，得到的社會互動卻是真實的：若被誤認為來自區域社會經濟結構中較下階的族群，可能會將自身暴露在另外一種污名情境中，此時障礙者便面臨是否揭露聽障者身份的兩難，甚或是反身性地負面看待自己的聽力損失。高夫曼的污名管理理論可以成功解釋這類情況，尤其是選擇佯裝為優越國族他者的情境下，聽障身份得到隱身。

不過，本研究也討論了高夫曼理論無法完全解釋的狀況。過去涉及污名管理的案例，大多僅涉及單一身份軸線中的對立組合，譬如同志佯裝為異性戀、障礙者佯裝為非障礙者、外國人佯裝為本地人等等，來避免污名情境。因為佯裝過程循著自身身份為可貶的管理邏輯，若討論佯裝對於當事人帶來的社會心理效應，預期上是可能強化自身身份的可貶特質。譬如，自閉症者描述「掩蔽」(masking) 自閉特質的過程中，需要付出龐大的心力，可能導致自閉症者逐漸不接受自己的自閉身份 (Bradley et al. 2021)。相較之下，在本研究中，聽障者受到誤認的經驗，涉及了兩條身份軸線，包括障礙與國族身份，這製造了更多的可能性，讓障礙身份的可貶特質有可能在自我認知中得到改變。其一，如同預期的，可貶特質可能得到強化，譬如因為誤認經驗而讓自己加深對生理損傷的負面看法；其二，可貶特質有可能得到消弭，儘管在本研究中這樣的案例是少數，但聽障者可能因為短暫以外國人的社會身體現身過，意識到聽障身體並不如先前自己預設的那麼不可欲，對於障礙身體的認知，進一步向正面轉移。在此種情況，異國身份並不隱身障礙身份，反而讓聽障身份的污名特質在障礙者的自我認知中逐漸消弭，使得即便不更動生理身體，也能透過重塑社會身體來治癒障礙。

本文呈現聽障者社群常提及的普遍經驗，這類生命經驗雖然較少受到學者關注，但的確是聽障者在日常生活中反覆經歷的重要經驗，並且對於部分聽障者產生了重要影響。本研究延續文化模式的障礙研究，在社會對障礙者的結構性壓迫之外，探討了這種結構下的系統性無知，如何讓口音成為社會符號系統，在社會互動中將身體分類，也由聽障者加以運用在身份實踐中，進而影響聽障者的社會位置與自我認知。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方淑華、陳慶華、王敬淳、楊惠媚、陳浩然 (Fang, Shu-hua, Ching-Hua Chen, Ching-Chun Wang, Hui-Mei Yang, and Howard Hao-Jan Chen)。2015。〈藉學習者口語語料庫探究日籍生常見的華語語音偏誤與教學建議〉“Jie xuexi zhe kouyu yuliaku tanjiu ri ji sheng changjian de huayu yuyin pian wu yu jiaoxue jianyi” [An Error Analysis on Japanese Learners' Chinese Pronunciation with the Aid of Chinese Learners' Oral Corpus], 《華語文教學研究》 *Huayuwen jiaoxue yanjiu*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2(3): 93-123。
- 吳佳臻 (Wu, Chia-Chen)。2014。〈聽覺障礙青少年文化認同與社會適應之研究〉“Tingjue zhangai qingshaonian wenhua renting yu shehui shiying zhi yanjiu” [The Study of Culture Identity and Social Adjustment of Adolescent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ed], 《障礙者理解半年刊》 *Zhangazhe lijie banniankan* [Semi-Annual of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13(1): 33-51。
- 吳雅琴、陳宇嘉 (Wu, Yia-Chin and Chen, Yu-Chia)。2011。〈雙手的溝通—手汗症者握手與牽手的尷尬與困窘〉“Shuangshou de goutong—shouhanzhengzhe woshou yu qianshou de ganga yu kunjioug” [Communication with Hands: Embarrassment and Hardship of People with Hyperhidrosis], 《社會發展研究學刊》 *Shehui fanzan yanjiu xuekan* [Journa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tudy] 10: 46-53。
- 邱大昕 (Chiu, Ta-Sing)。2007。〈男性視覺障礙者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Nanxing shijue zhangazhe raodong bianyuanhua de yanggang kunjing” [Dilemmas of Masculinity: A Study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Males],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Nuxue xuezhi: funu yu xingbie yanjiu*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23: 71-91。
- 。2012。〈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身心障礙研究?〉“Weisheme xuyao nuxing zhuyi shenxin zhangai yanjiu?” [Why Do We Need Feminist Disability Research?], 《婦研縱橫》 *Fuyan zongheng*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96: 16-24。
- 紀大偉 (Chi, Ta-Wei)。2012。〈情感的輔具：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Qinggan de fuju: ruoshi, lizhi, shenxin zhangai xushi” [Affect as Prosthesis: Minority, “Inspira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Disability Narrative], 《文化研究》 *Wenhua yanji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5: 87-116。
- 林韋成 (Lin, Wei-Cheng)。2019。《聽力保衛戰：人工電子耳、社會技術網絡與聽障/聾人社群》 *Tingli baoweizhan: rengong dianzier, shehui jishu wangluo yu tingzhang/rongren shequn* [The War of Hearing: Cochlear Implants, Socio-Technical Networks and Hearing Impairment/Deaf Community]。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Tianzhujiao Fujen daxue shehui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林惠芬 (Lin, Hui-Fen)。2004。〈高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Gaozhi qingdu zhineng zhangai xuexheng xuexiao shenghuo shiying zhi yanjiu” [A Study of Adaptation of School Life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 Student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特殊教育學報》 *Teshu jiaoyu xuebao*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19: 57-85。
- 林駿杰 (Lin, Jun-Jie)、張恒豪 (Chang, Heng-Hao)。2020。〈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Sheme shi zhangai yanjiu? Yingmei de lilun fazhan, jianzhihua yu Taiwan bentuhua licheng” [Defining Disabilit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UK and US and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Renwen ji shehui kexue jik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2(4): 645-691。
- 周淑惠、趙瑋琛、簡儀佳 (Chou, Shu-Hui, Wei-Chen Chao, and Yi-Chia Chien)。2009。〈寂靜之外：聽障遊客的旅行經驗探討〉“Jijing zhiwai: tingzhang youke de luxing jingyan tantao” [Beyond Silence: A Journey into the Travel World of the Deaf], 《戶外遊憩研究》 *Huwai youqi yanjiu*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Study] 22(3): 1-29。

- 游政諺、陳孝平 (Yu, Cheng-Yen and Chen, Michael S.)。2015。〈就醫路關卡多：成年聽覺障礙者就醫經驗之研究〉“*Jiuyilu guanka duo: Chengnian tingjue zhangaizhe jiuyi jingyan zhi yanjiu*” [Hitches Abound Along the Way: A Study of Deaf Adults’ Experiences in Seeking Medical Care in Taiwan], 《臺灣社會福利學刊》*Taiwan shehui fuli xuek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2(2): 145-184。
- 張稚鑫 (Chang, Chih-Hsing)。2004。《徘徊在「聽」與「聾」之間：回歸主流教育中聽障大學生的身份認同》*Paihuai zai ting yu long zhijian: huigui zhuliu jiaoyu Zhong tingzhang daxuesheng de shenfen renting* [*Being Hearing or Being Deaf? : The Identity 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in Mainstream Education*]。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pei daxue shehui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陳淑杏 (Chen, Shu-Hsing)。2013。〈「妳嫁來台灣多久了？」：外國口音與口音成見之初探〉“*Ni jialai Taiwan duo jiu le?: waiguo kouyin yu kouyin chengjian zhi chutan*” [“How long have you been married to a Taiwanese?”: A Preliminary Survey on Foreign Accents and Accent Stereotypes], 《華語學刊》*Huayu xuekan* [*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14: 8-34。
- 陳好甄 (Chen, Yu-Chen)。2021。《聽覺障礙者使用同步聽打服務經驗之探討》*Tingjue zhangaizhe shiyong tongbu tingda fuwu jingyan zhi tantao* [*A Study on the Experiences of Using Real-Time Captioning Services of People with Hearing Loss*]。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fujian zishang yanjiu suo sh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郭惠瑜 (Kuo, Hui-Yu)。2020。〈障礙與性別的交織：探討小兒麻痺女性母職經驗〉“*Zhangai yu xingbie de jiaozhi: tantao xiaoer mabi nuxing muzhi jingyan*”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Disability: The Experiences of Motherhood among Taiwanese Women with Polio],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Nuxue xuezhì: funu yu xingbie yanjiu*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46: 79-122。
- 郭曉蕻、游美惠 (Kuo, Hsiao-Chen, and You, Mei-Hui)。2013。〈聽障女同志的家庭成長經驗與學習處境探究〉“*Tingzhang nutongzhi de jiating chengzhang jingyan yu xuexi chujing tanjiu*” [Exploration on Family Growth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Situation of Hearing-Impaired Lesbians],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Xingbie pingdeng jiaoyu jika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Quarterly*] 62: 21-38。
- 萬宗綸 (Wan, Tsung-Lun Alan)。2016。〈轉聲/身術：臺灣聽障者的賽伯格、身分協商與空間性〉“*Zhuansheng/shenshu: Taiwan tingzhangzhe de saiboge, shenfen xieshang yu kongjianxing*” [Transformation: Cyborg, 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Spatiality of Hearing Disabled People in Taiwan], 《地理學報》*Dili xue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81: 1-26。
- 。2021。〈電子耳與「聽」的展演：社會語言學的取徑〉“*Dianzier yu ting de zhanyan: shehui yuyan xue de qujing*” [Cochlear Implants and Performing Hearingness: A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科技、醫療與社會》*Keji, yiliao yu shehui*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3: 167-194。
- 董怡寧、邱春瑜、游鯉綺、許朝富、周倩如 (Tung, Yi-Ning, Chun-Yu Chiu, Li-Chi Yu, Jacky Hsu, and Chien-Ju Chou)。2022。〈一句話惹惱障礙者：以污名溝通模型探究障礙歧視話語之詮釋與回應〉“*Yi ju hua renao zhangaizhe: yi wuming goutong moxing tanjiu zhangai weiqishi huayu zhi quanshi yu huiying*” [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response: Using the model of stigma communication to explore perspectives toward disability microaggressions during daily conversation], 《特殊教育季刊》*Teshu jiaoyu jikan* [*Bulletin of Special Education*] 47(2): 1-32。
- 詹穆彥 (Chan, Mu-Yen)。2017。〈疾病範疇與自我轉變：以台灣成年妥瑞人為例〉“*Jibing fanchou yu ziwo zhuanbian: yi Taiwan chengnian tuorui ren wei li*” [Disease Categories and Personal Identity: Adult Persons with Tourette Syndrome in Taiwan], 《科技、醫療與社會》*Keji, yiliao yu shehui*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25: 7-62。

- 歐子瑩 (Ou, Tzu-Ying)。2020。《從社會文化脈絡理解聽覺損失對前庭導水管擴大症者的意義》*Cong shehui wenhua mailui lijie tingjue sunshi dui qianting daoshuiguan kuodazhengzhe de yiyi* [Locating Meaning of Hearing Impairment for People with Large Vestibular Aqueduct Syndrome within Taiwan'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Kaohsiung shifan daxue teshu jiaoyu xuexi sh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謹菀 (Shen, Perng)。2020。《醫療與我：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大學生的自我認同》*Yiliao yu wo: zhuyili quexian guodongzheng daxuesheng de ziwo renting* [Medical Label and Intervention and Self-Identit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Taiwan]。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teshu jiaoyu xuexi sh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藍佩嘉 (Lan, Pei-Chia)。2005。〈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族化〉“Jiecenghua de tazhe: jiaowu yigong de zhaomu, xunlian yu zuhua” [Stratified Otherization: Recruitment, Training and Racialization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臺灣社會學刊》*Taiwan shehui xuek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1-57。
- Ahearn, Laura (蘿拉·阿赫恩) 著, 劉子愷、吳碩禹、蕭季樺 (Liu, Tzu-Kai, Shuoyu Charlotte Wu, and Chi-Hua Hsiao) 譯。2020。《活出語言來：語言人類學導論》*Huochu yuyan lai: yuyan renleixue daolun* [Living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台北 (Taipei)：群學 (Socio Publishing)。

二、外文書目

- Bamberg, Michael. 2004. “Talk, Small Stories, and Adolescent Identities,” *Human Development* 47(6): 366–369.
- Baran, Dominika. 2014. “Linguistic Practice and Identity Work: Variation in Taiwan Mandarin at a Taipei County High School,”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8(1): 32–59.
- Baynham, Mike. 2011. “Stance, Positioning, and Alignment in Narrative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Language in Society* 40(1): 63–74.
- Bourdieu, Pierre, translated by Gino Raymond and John B. Thompson.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adley, Louise, Rebecca Shaw, Simon Baron-Cohen, and Sarah Cassidy. 2021. “Autistic Adults’ Experiences of Camouflaging and Its Perceived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Autism in Adulthood* 3(4): 320–329.
- Bucholtz, Mary and Kira Hall. 2016. “Embodied Sociolinguistic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edited by Nikolas Coupland, pp. 173–1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der, Jeremy. 2021. “Whose Indexical Field Is It?: The Role of Community Epistemology in Indexing Social Mean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Meeting of the Texas Linguistics Society*, edited by Caitie Coons, Gabriella Chronis, Sofia Pierson, and Venkat Govindarajan, pp. 39–55. Austin, Texas.
- Campbell-Kibler, Kathryn. 2007. “Accent, (ING),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Listener Perceptions,” *American Speech* 82(1): 32–64.
- Chrisman, Wendy L. 2011. “A Reflection on Inspiration: A Recuperative Call for Emotion in Disability Studies,” *Journal of Literary & Cultural Disability Studies* 5(2): 173–184.
- Cowie, Roddy and Ellen Douglas-Cowie. 1992. *Postlingually Acquired Deafness: Speech Deterioration and the Wider Consequences*.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a Silva, Caroline, Judith De Jong, Allard R. Feddes, Bertjan Doosje, and Andreea Gruev-Vintila. 2022. "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Understanding Misrecognitio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French and Dutch Muslim Women Studen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10(1): 201–217.
- 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Grue, Jan. 2015. *Disabilit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Farnham: Routledge.
- . 2016. "The Problem with Inspiration Porn: A Tentative Definition and a Provisional Critique," *Disability & Society* 31(6): 838–849.
- Hopkins, Peter, Katherine Botterill, Gurchathen Sanghera, and Rowena Arshad. 2017. "Encountering Misrecognition: Being Mistaken for Being Musli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07(4): 934–948.
- Huynh, Que-Lam, Thierry Devos, and Laura Smalarz. 2011. "Perpetual Foreigner in One's Own Land: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0(2): 133–162.
- Kiesling, Scott F. 2018. "Masculine Stances and the Linguistics of Affect: On Masculine Ease," *NORMA* 13(3–4): 191–212.
- Kim, Eunjung. 2016. *Curative Violence: Rehabilitating Disability,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Kore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itchin, Rob. 1998. "'Out of Place', 'Knowing One's Place': Space, Power and the Exclusion of Disabled People," *Disability & Society* 13(3): 343–356.
- Mao, LuMing Robert. 1994.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ited and Renewed," *Journal of Pragmatics* 21(5): 451–486.
- Martineau, Wendy. 2012. "Misrecognition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Shaping the Space for a 'Fusion of Horizons'," *Ethnicities* 12(2): 161–177.
- Silverstein, Michael. 2003.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3(3): 193–229.
- Su, Hsi-Yao. 2008.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Girl with Qizhi?: Refinement, Gender and Language Ideologi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3): 334–358.
- Waldschmidt, Anne. 2017. "Disability Goes Cultural: The Cultural Model of Disability as an Analytical Tool," in *Culture – Theory – Disability*, edited by Anne Waldschmidt, Hanjo Berressem, and Moritz Ingwersen, pp. 19–28.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附件一、受訪者基本資料與身份誤認經驗

受訪者	性別	敘事分組	被誤認經驗	被誤認對象
Peiyu	女	自發敘事	有	陸生（被中國籍學生誤認）
Sandy	女	自發敘事	有	馬來西亞華人
安妮	女	自發敘事	有	國際學生
小薇	女	自發敘事	有	華僑
瑪姬	女	自發敘事	有	中國人
玲玲	女	自發敘事	有	移工（印尼、泰國等）、馬來西亞華人
小君	女	自發敘事	有	印尼移工、華僑
貝拉	女	自發敘事	有	沒有特別指出什麼國家
Grace	女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敏嘉	女	自發敘事	沒提到	
韓媽	女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安信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小鄭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小雨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潘先生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小趙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阿耀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洪仔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淑倫	女	誘發敘事	有	中國籍配偶
Q姐	女	誘發敘事	有	僑生
小魯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越南人或菲律賓人
小花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或中國人
小凡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或韓國人
麥脆ㄐ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
艾達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
美櫻	女	誘發敘事	無	
小惠	女	誘發敘事	無	
坎尼	女	誘發敘事	無	
小柚	女	誘發敘事	無	
張伯	男	誘發敘事	有	香港籍學生
維飛	男	誘發敘事	有	香港人或日本人
阿偉	男	誘發敘事	有	東南亞移工
佐佐	男	誘發敘事	有	被警察臨檢問是不是台灣人
松鼠	男	誘發敘事	有	中國人
振宇	男	誘發敘事	有	香港人
威廉	男	誘發敘事	有	中國人
阿凱	男	誘發敘事	無	